

所謂“苦肉緩兵計”是沒有历史 根据的主觀捏造

姚 薇 元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现在正在热烈地争论着。其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是罗尔纲同志的“伪降说”。他认为李秀成“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李秀成自述》是“要以智取敌人”的“隐蔽的、曲折的”“一条苦肉缓兵计”^①。一种是戚本禹同志的“变节说”。他认为《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李秀成是一个“投降变节，屈膝媚敌”的变节分子^②。一说是革命英雄，一说是变节叛徒。究竟谁是谁非呢？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判明阶级立场，分清敌我界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这场争论正是当前阶级斗争在历史学领域里的反映。一切从事史学工作的人，特别是从事近代史工作的人，既不应该置身事外，缄口不言，也不应该唯唯否否，模稜两可。我们认为戚本禹同志的“变节说”是正确的，罗尔纲同志的“伪降说”是沒有历史根据的。所谓“苦肉缓兵计”，完全是一种顛倒是非的主观捏造。现在把个人的粗浅看法写出来，請罗尔纲同志和读者同志们批评。

一、所謂“苦肉緩兵計”的中心內容——“伪降說”的關鍵

什么叫做“苦肉缓兵计”呢？根据罗尔纲同志自己的解释：“李秀成先在《自传》里故意自污自辱以示信于敌人，其目的是要使敌人暂缓进攻，所以叫做苦肉缓兵计”。

这是罗尔纲同志对《李秀成自传》反复鑿证了二十年，直到去年八月，才獲得的“意外发现”，是他“对李秀成沒有降敌的看法”的新发展。

罗尔纲同志写了一篇长达七万字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他运用“探微索隐，闡幽发潜”的考据方法，把《李秀成自传》里一切輕蔑革命、恭維敌人的叛徒供词，曲解为不是“为着要投降怕敌人不肯相信而说的”，而是“有所为而言的”，即为了“哄骗曾国藩”，使他接受“李秀成这条苦

肉缓兵计”而说的骗人的假话。这样，罗尔纲同志把李秀成写的白纸黑字的变节投降的“自白书”，塗改成为“一条唯一救亡的大计”的“革命文献”了。

在文章的《緒言》里，开宗明义地指出：“李秀成这条苦肉缓兵计”的内容，含有下列三个部分：

（一）“首先是使敌人不向广德、湖州追击幼天王，以保护这一面作为号召太平天国

①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載《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以下引罗尔纲同志的話，均見此文。

② 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載《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的旗帜的幼天王的安全。”

(二)“其次是使敌人不向广德、湖州进军,以掩护广德,湖州军队向江西转进。”

(三)“最后是提出‘收齐章程’^①,使敌人暂停截击,以掩护长江南北大军取得会师,从而达到早已预定的踞西北,图中原的大计。”

按照下文的“探索”,上述三项内容,实际上是李秀成实行“锦囊妙计”的三个步骤。第一、第二两项,是为实现第三项“做了地步”。也就是说,“李秀成给幼天王打掩护”,“给将要保卫幼天王向江西转进的广德、湖州军队打掩护”,都是为了实现“李秀成计策最后一步,要用‘收齐章程’,使长江两岸太平军得在‘招抚’的掩护下,取得机会,以完成会师的任务”。

据罗尔纲同志说:早在半年以前(1863年12月),李秀成从苏州赶回天京的目的就是要劝天王放弃天京“让城别走”来实行这

条大计。但是,“李秀成为着要掩饰他对太平天国的尽忠”,他在《自述》里却说是为了想念母亲在京的缘故。

罗尔纲同志根据上述的种种设想,从而十分自信地断言:“李秀成这一个事实,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出,毋须千言万语去讨论他的立场,他的立场正在这里。李秀成这一种做法,也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出,毋须千言万语说明他的用计,他的用计也就在这里。”

由此可见,所谓“苦肉缓兵计”的第三项内容,乃是他的中心内容。李秀成的用计,李秀成的立场,都在这里。这就是说,罗尔纲同志的“李秀成伪降说”的关键,也正在这里。

为了弄清问题,辨明大是大非,我们针对罗文的主要论点,提出下列几个问题,进行考察。

二、李秀成一贯地反对“扫北大计”,并未隐瞒

罗尔纲同志说:“李秀成在1863年12月(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一月)从苏州赶回天京,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放弃天京,经江西,出湖北,会合扶王陈德才大军踞西北,图中原,是当时太平天国救亡无上良策”。这是说,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的目的是为了要实行会师湖北,踞西北,图中原的战略计划。我们反复细读《李秀成自述》的原稿,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发现了罗尔纲同志的这种说法,是歪曲历史事实的臆说。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和太平天国的“救亡良策”,(按即扫北大计),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李秀成对扫北大计,是一贯反对的。

原来,太平天国的这项战略计划,并不是如罗尔纲同志所说,“是李秀成制定的”,

而是洪仁玕在1860年5月11日(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初一日)的天京最高会议上提出,经洪秀全“旨准”实行的。按现存《洪仁玕自述》里明白写道:

“三月二十六日(天京)解围,四月初一日,登朝庆贺,且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闽、浙,独忠王从吾所议云: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遙,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

① 按《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收齐章程”,罗尔纲同志误作“招齐章程”。

輪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洪仁玕的这个建议，是先乘胜攻取下游苏、杭等地，充实军事设备后，分兵三路，向长江上游进攻，合取湖北及沿江各地，以巩固天京根本。确是进取良策。当时经洪秀全“旨准，即依议发兵”。李秀成虽表示赞同，可是，等到取得苏、常等地之后，“英王如议进取蕲、黄”（今湖北浠水、黄冈，时在1861年3月中旬），而李秀成却阳奉阴违，在沿途招降纳众，逡巡不前，直到1861年6月间到达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后，竟借口“憚于水势稍漲，撤兵下取浙江”，放弃了“合取湖北”①的计划。

李秀成这种违抗军令，自由作主的专横行为，遭到洪秀全的斥责。《李秀成自述》曾明白地写道：“八月中旬（1860年9月下旬），天王严詔頒到”，催促他“领军而去扫北”。他本“不欲扫北”，只因“在苏肯（答）应江西、湖北肯降之义民，应肯（该）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师而上江西、湖北”。他从苏州到天京后，在“合朝文武”的会议上，竟无耻地誇大湘军“能受苦坚（艰），此军常胜，未见败过”，恐吓大家“要多买米粮”，防备被困断粮。洪秀全斥责他“怕死”，他竟扬言“我这出京，四百余日，方见我信”，表示不负解围责任。果然，他出京后，并不“遵旨扫北”，却由皖南经江西到湖北，沿途招降纳众，遇到曾国藩、鲍超、胡林翼等敌军，都竭力躲开，不敢接仗。到1861年9月间，先后招收了江西、湖北等地起义群众“三十万之众”（谱），和石达开旧部二十余万，就匆匆退走，“顺下浙江”，专力攻取杭州了。

由于李秀成的违抗扫北大计，貽误戎机，安庆终于失守了（1861年9月5日），

天京裸露在敌军面前，形势日益紧急。当时，陈玉成主张派陈得才等进军西北，“广招兵马，早复皖省”，②自己经略皖北，“以图大征大勦进取之机”③。赖文光主张“北连张、苗（张洛行，苗沛霖），以固京左，次出奇兵取荆襄之地”④。而李秀成却在江浙下游，忙于“开疆拓土”⑤，“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⑥。洪仁玕在1862年2月，写信劝告他说：

“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州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

洪仁玕很形象地说明了进取湖北，保卫皖北的重要性。但李秀成却强调敌人势力强大，用“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⑦的话，婉转推延。直到湘军“逼近京都”，洪秀全“一日三道差官捧詔到松江”，催他出

① 以上引文均見《洪仁玕自述》，見《太平天国》Ⅱ，第852頁。当李秀成軍到达湖北兴国州时，陈玉成虽因安庆圍急，返回皖北；但賴文光还留在黃州，假如李秀成愿意执行“合取湖北”的战略計劃，“会师武昌”，是不难實現的。

② 《賴文光自述》，見《太平天国》Ⅱ，第863頁。

③ 《陈玉成致張洛行書》，見《太平天国》Ⅱ，第746頁。

④ 《賴文光自述》，見《太平天国》Ⅱ，第863頁。

⑤ 《李秀成諭尙海松江軍民》，見《太平天国》Ⅱ，第743頁。

⑥ 《洪仁玕自述》，見《太平天国》Ⅱ，第852頁。

⑦ 《洪仁玕自述》，見《太平天国》Ⅱ，第852頁。

兵。李秀成这时“轄百余万众”，不允“启队发行”，并且再一次地强调“湘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推说要“待廿四只(个)月之后，再与其解京围”，他想把解围的责任推给陈玉成旧部陈德才来担任^①，而自己却稳身不动，坐鎮他的“独立王国”。洪秀全严令“若不遵詔，国法难容”，派刑部莫仕襄“专催起马”，当面斥责他对天国“不忠”，“有自图之意”，才“不得不行”。

这时，李秀成懊惱頹丧到“无心在世”，只因母亲年老，“曲而从之”，带领兵马连同母亲和妻子“一并回京，交主为质”。在这样的被动消极的情绪支配下，战事是很难取胜的。果然打了四十多天“未能成效”，被洪秀全“严责革爵”，飭令“进兵北行”。他在皖北一带转战了半年，毫无进展，反丧失了兵力十余万人。后因雨花台失陷，才从寿春调回天京。他在天京得到苏杭被围的消息，十分懊丧地说：“若我不来京者，不过北者，其万不能攻我城池也”^②。

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自参加天京最高会议后，就一心“下扫苏、杭、常、鎮，冀图开疆拓土”^③，招降纳众，隐有“自图之意”。对洪仁玕建议，洪秀全“旨准”的战略计划（即扫北大计），一直采取阳奉阴违乃至公开抗拒的态度。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失利，李秀成不能不负主要的责任。李秀成这种行为，不仅在当时遭到洪秀全的屡次斥责，后来许多天国将领也都对他表示鄙视和不满：洪仁玕说他“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破坏了“前议大局之计”^④。賴文光说他“绝不知几，遗君命而妄攻上海”^⑤。黄文英说他是一个“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人^⑥。这些都是李秀成反对“扫北大计”的显明见证。但是，罗尔纲同志却根据李秀成的进军上海的檄文中“去冬恭承简命，统师上游江楚”^⑦的官样文章，证明《李秀成自述》里的“不欲扫北”，“逆主之命”，

等供词是假话；根据曾国藩《近日军情片》^⑧向清政府奏报的话，证明“这一个战略计划是李秀成制定的”。不管罗尔纲同志的主观愿望怎样“良善”，他的辛勤的历史考据，实际上就等于歪曲事实的历史捏造了。

不仅如此，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罗尔纲同志一面肯定李秀成提出的“讓城别走”就是“经江西，出湖北，会合扶王陈德才军踞西北，图中原”的大计。一面却又自相矛盾地说李秀成“对讓城别走大计的內容却只字不提”，并由此断定李秀成的立场的坚定，用计的隐蔽。不知罗尔纲同志用的是什麼逻辑？！难道李秀成的白纸黑字的亲笔供词，交代得还不够彻底吗？《李秀成自述》里不是早已“明白写清”陈德才北上招兵的行踪，天王严令扫北，“接陈德才之军，收平北岸”吗？李秀成对天国的扫北大计，“并未瞞隐半分”，而罗尔纲同志却替他隱瞞，说是“只字不提”。这不是閉着眼睛說瞎話嗎？其实，李秀成不仅向敌人交代了扫北大计，而且“自愿将國中一切供呈”，

① 据《李秀成自述》，李秀成曾調陈德才到苏州，令他到西北“招足人馬，二十四个月回来解救京城”。

② 以上引文均見《李秀成自述》原稿。

③ 《李秀成致張洛行書》，見《太平天国》，Ⅱ，第722頁。

④ 《洪仁玕自述》，見《太平天国》，Ⅱ，第852頁。

⑤ 《蓮王賴文光供詞》原本，見《民報》，第20期，第102頁。

⑥ 《黃文英自述》，見《太平天国》，Ⅱ，第858頁。

⑦ 《李秀成諭尙海松江軍民》，見《太平天国》，Ⅱ，第743頁。

⑧ 見《曾國藩全集·奏稿》卷18，《近日軍情片》。

把洪秀全“立国来历”，“得失惧国情由”，以及当时太平军分布地点和将领姓名等等，都一一交代出来了。李秀成的供辞，比起郜永宽、黄子隆等叛徒的告密内容①，有过

之，无不及。不知罗尔纲同志究竟用什么样考据方法，竟能找出它们之间还有“一个何等不同的鲜明对照的事实”！

三、“讓城別走”是李秀成的逃跑主义，不是用計

如上文所说，李秀成的实际行动既然一贯反对扫北大计，那末，他向洪秀全所提的“讓城別走”，显然另有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秀成对“讓城別走”大计的内容，倒的确是“只字不提”，諱莫如深呢！究竟李秀成想走向哪里，作何打算，还得从他的供词里寻找解答。

李秀成一向留恋苏杭，“不欲扫北”，他的“来京过北”，本是万不得已的事。直到1863年6月，湘军攻陷雨花台，“京城惊乱”的危亡关头，他依然念念不忘他的独立王国。甚至不顾一切，“奏三求四”，硬要返回苏州。宁愿交出餉银十万两，脱身东下。他的内心意图是，“总得出京门，再行別计”。回到苏州后，看到部将“各有他心”，形势不妙，不敢驻进城内，“将军屯紮马塘桥”（在苏州、无锡之间）。这时，他“意欲回京奏请，主他行，不守京都”，但未实行。在他看来，天国“其势不久”，早晚就要完蛋了。他明知郜永宽等人接洽降清，不仅“不严其法”，反而告诉他们：“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这时他自己还不敢冒险投清，那是因为：第一，“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②；第二，“因我粵人，无门可投”。苏州失陷后，他乘夜逃到丹阳，他的从弟李世贤劝他不要回天京，到溧阳“別作他謀”。无奈他的母亲和妻子被押在天京，不得不硬着头皮赶回天京。

1863年12月20日；李秀成回到天京后，第二天就向洪秀全一再启奏要“讓城別

走”。理由是：“曾帥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京城不能保守”。并恐吓说：“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粮道绝门，京中人心不固”，“没绝定也”！

不管在当时军事形势下，“讓城別走”应否提出和是否可行，李秀成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启奏，充分暴露了他对革命前途业已丧失信心，产生严重的逃跑主义思想。当时遭到洪秀全的严厉斥责，指出他害怕曾妖，“怕死，便是会死”！禁止他干预政事；如果违令，“合朝誅之”！这样，李秀成才勉强安住下来，但心里还时刻“欲出京去”。只因“合城男女之留，不然久而（已）他去矣”。他痛恨“洪姓佞臣”扣留“入京者，不能出京”，密令开城放走不能坚持革命的“寒家男妇”十三、四万人“逃生”，让他们投到敌军设立的“难民局”里去。他非常悔恨自己不该返回天京，“辞心而藏京内，逼气而陪其亡”。否则

① 《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四，〈上曾相〉書：“据苏城降酋納逆，无锡擒酋潮逆食称：忠逆欲由宁国县，常、玉山窜江西，繞湖北，而接連伪扶王陈得才”。

② 有人根据戈登的《备忘录》里，有“納王（郜永宽）之子告訴我，忠王愿意来降的”的記載，怀疑李秀成曾接洽投降。但据苏州沈某《劫余灰录》和潘鍾瑞《苏台麋鹿記》等記載，当时慕王和忠王都未参加。戈登轉述納王儿子的話，孤証，未可尽信。

“我将兵数十万在外，任我风流，而何受此难者乎？！”

根据李秀成自己的说明，所谓“让城别走”，实际上就是“弃城逃走”的同意语，是赤裸裸地在活命哲学指导下的逃跑主义，丝毫也看不出它跟太平天国的扫北救亡大计，有什么关系。但是，罗尔纲同志却硬说“清清楚楚地看出”，李秀成的立场“正在这里”，李秀成的用计，“也正在这里”，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罗尔纲同志会说：我说李秀成的用计和立场是指的他向敌人隐瞒了“让城别走”的大计内容。不是你说的“逃跑主义”。是的，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罗尔纲同志认为“让城别走”，就是“放弃天京，经江西，出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大军，踞西北，图中原，是当时太平天国救亡无上良策”。这层我在上文已经辩明：这条救亡良策，李秀成已经向敌人彻底交代了，并没有隐瞒。罗尔纲同志的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罢了。我们认为李秀成的“让城别走”跟所谓“救亡无上良策”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它是李秀成在敌军围攻的威胁下，丧失了革命信心，企图逃生活命的逃跑主义的表现。在这点上，罗尔纲同志颠倒是非，把一个专求活命的逃跑主义者，当作坚决实行救亡大计的革命英雄了。

人们不禁要问：李秀成“让城别走”的主张是他在天京失陷半年之前，驻在苏州时就准备提出的，难道他没有任何打算，只是开城逃走吗？是的，这确是一个必须解答的疑问。

考李秀成部属洋将英国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写道：

“忠王认清英国坚持向太平军作战，而太平军无力进行抵抗之后，就马上决定采取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放弃所有容易受到威胁的地

方，退往内地；因为，英军无法到内地去和他们作战，清军也无法在内地阻遏他们的军事行动，制止他们增添兵力，阻碍他们的未来进展。我在辞别忠王之前，参加过几次会议，这些会议曾讨论了上述计划，当时全体到会的首领一致赞成这种计划。”①

同书又引载戈登的《备忘录》说：

“（186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忠王自无锡抵苏州，……曾倡议放弃苏州和南京，将全部太平军转移至广西，事实上这等于放弃了他们的事业。慕王反对此议，主张坚守，奋战到底。”②

可见，李秀成在1863年11月底离开苏州之前，曾与苏州守将商讨放弃苏州和南京，转移到广西的计划，因慕王谭绍光反对作罢。按李秀成在《自述》里说他“在苏州与洋鬼开仗，连战数日，胜负未分”，“意欲回京奏谏，请主他行，不守京都，自思议之后，尚未举行”。二者所记，正是一件事。由此可以证明，李秀成到天京之后，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大计内容，就是放弃天京（那时苏州已失），逃回老家广西去。如此而已。

其实，李秀成要回广西老家的想法，并不是从1863年才开始的。据《蒙时雍家书》里说，庚申年（1860年）他向跟随石达开西征后来返回天京的将兵打听到他家乡广西平南的亲友情况。当时，“又适忠王有欲收复粤西之举，……曾修书一封，托其顺寄。后因忠王此举未行，是以此书未能寄到”。③

① 见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622—623页。

② 见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568页。

③ 《蒙时雍家书》，见《太平天国》，Ⅱ，第757页。

可见，早在1860年间，李秀成就有此打算。有人要问：你说李秀成的“让城别走”是逃跑主义表现，为什么他在1860年就打算返回老家呢？这也不难理解。前节说过，李秀成在1860年奉召回京，因为“不欲扫北”，被洪秀全“責伐(罰)难堪”，在“逆主之命，信友之情”的思想情绪支配下，借西征之便，顺道折回老家，这里可能带有“衣锦还乡”的想法。这种想法，在《蒙时雍家书》里，有充份的表现，可为佐证。一个对革命没有正确认识的人，无论在胜利或失败的场合，都会时刻不忘他的个人小天地的。由此可以明白：李秀成在《自述》里，说他参加革命是“因食而随”，“迷迷惺惺而来”，是“骑

在虎背，不得不由”等等，不是什么“自污”的假话，而是“珍(真)实言也”。

正是由于思乡情绪和活命哲学的支配，李秀成在《自述》里，写到他保释韦志俊的事件时，表示十分羡慕说：“今韦志俊生命投入清朝而得回家之乐，性命实我保全回家乐也！我之难，无门而死，亦不叹也”！

总之，李秀成的“让城别走”，是畏难怕死，企求活命的逃跑主义的表现，它与洪仁玕的扫北救亡大计，背道而驰。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罗尔纲同志把它们混为一谈，从而“发现”了他的“苦肉缓兵计”，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四、“收齐章程”是叛徒贖罪的獻策，不是什么“苦肉緩兵計”

罗尔纲同志说：“李秀成这条苦肉缓兵计的最后一步是提出‘招(收)齐章程’，使敌人暂停截击，以掩护长江南北大军取得会师，从而达到早已预定的踞西北、图中原的大计。”

我们姑且不说，李秀成从来就反对这个“早已预定的大计”，不可能在被敌人俘虏后，反而要想实行起来。退一万步说，即使承认李秀成这时果然要实行这条大计；试问：按照“收齐章程”的办法去做，能够达到会师的目的吗？

据罗尔纲同志的设想，“当时长江南北的太平军距离虽不远，但都不在长江两岸，一边要渡江，一边要接应，……为着取得机会，取得时间，以完成横渡长江会师的艰巨任务，就必须打掩护。李秀成的‘收齐章程’，便是估计了这一种军事形势而提出来的”。李秀成的“收齐章程”运用“非常委婉的文章”，说得“娓娓动听”，“入情入理”，“使曾国藩不得不投入到他的‘招(收)齐章程’的网罗里去”。“他直到临就

义前的一刻，还用这条绳子，紧紧地拉着曾国藩的鼻子走”。

“收齐章程”原文俱在，暂且不用翻看，单听罗尔纲同志这段异想天开的话，人们如果不是白痴或婴儿，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不禁要问：一个已被敌人关进了囚笼里的俘虏，究竟有什么样的魔术的绳子，能够拉着兇恶万张的敌军统帅的鼻子走呢？

罗尔纲同志责怪人们“不懂得李秀成‘招(收)齐章程’的关键”，才会怀疑实行“收齐章程”会导致太平军瓦解。关键在哪里呢？据说，关键就在于李秀成与由他保举的几个“自己人”，用外地人听不懂的广西潯、梧的方言隐语办事，这样就可以躲过曾国藩派来监督的人的耳目，暗中指挥长江两岸的军事行动，完成南北大军会师的任务。试问：李秀成要求派去监督的马玉堂，原是勾串太平军叛徒的特务，难道听不懂潯、梧方言吗？即使他听不懂，难道几十万湘军中，竟没有一个潯、梧人么？如果曾国藩另派一个潯、梧人去监督，那末，关键岂不

是落到曾国藩的手里了吗？何况，关在囚籠里的俘虏，竟能指挥长江两岸军事行动，这样奇蹟，只有在儿童神话故事里，才能找到。可见所谓关键也者，不过是一种极端幼稚的设想而已。

其实，“收齐章程”明明是李秀成企图“乞貸一命，招降贖罪”的叛徒献策。白纸上写的黑字，本是一目了然。无奈，罗尔纲同志戴上有色眼镜来看，淆乱了黑白，竟把一个叛卖革命誘骗集体投降的方案，看成了哄骗敌人，完成会师任务的“苦肉缓兵计”了。

《李秀成自述》里说得明白：李秀成在天京回城中，早已“欲出京去”，“别作他謀”，只是“因我粵人，无门可投”，加以李鴻章杀降的恐怖情形，记忆犹新，“至今为头子(者)，不敢投(降)”。城破被俘后，他以为“本应早日誅刑”，不料竟“恩给飯茶足食”，“承蒙迟究”，不免受寵若惊，“敢带(感戴)靡涯”。活命的念头在李秀成的心里冒头了。为了讨好劊子手，獲得一线生机，“自愿将国中一切供呈”，用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写了五万多字的“详供”。在这个“详供”里，用尽一切想得到的词句，污蔑革命，恭維敌人，最后还拟出一套誘骗太平军集体投降的计划——“收齐章程”，作为乞貸一命，立功贖罪的献礼。

李秀成要贖的是什么罪呢？要立的是什么功呢？李秀成在《自述》里写得一清二白：他誣蔑太平天国革命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害民害众”，是“造反”。辱骂革命人民是“不良、不义、不孝”的“众匪”。自称“罪将”、“军犯”。痛悔自己“不知分毫之事”，“懷懷而随”，走上了“逆天”、“害民”的罪恶道路；否则“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李秀成在反革命敌人面前下跪了，他表白自己以

前所作所为只是“愚忠”，“在秦为秦，在楚为楚”。现在“楚肯容人，亦而(以)死报”；如果中丞大人和老中堂“能以奏清(請)圣上，肯赦此粵之人，甚为美甚”。“罪将是本不才”，“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酌高厚”，“以酌(贖)旧日有罪愚民”。李秀成深怕他的新主子不相信他的“心虚有余，无有二意”，竟拿脑袋作为抵押，提出了保证：“若我能此本事收复(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

显然，在李秀成的心里，革命就是犯罪，犯了罪就只有替新主子效劳，卖命“立功”，才能贖罪。李秀成给他自己画的这幅叛徒嘴臉，难道还不够清楚的嗎？

所谓“收齐章程”，就是李秀成叛卖革命，企图瓦解和消灭太平军的反革命计划，是叛徒的罪证。它的目的是：为了“免劳(费)大清财貨，免劳将相之心”，“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它的策略是：“用仁爱为刀，而平天下”，“仁义而服世间”。即采用“招撫”手段誘骗太平军将士背叛革命事业，放下武器，当大清顺民。具体办法包括下列几项：

第一，解送李秀成到安庆，以便居中收服南北两岸的太平军。

第二，由曾国藩派一、二人，最好是马玉堂和赵金龙，随同李秀成差使前往安庆。

第三，由李秀成保薦几个太平军俘虏，携带曾国藩的“手諭”，连同盖有李秀成的印信，并“亲画密号”的亲笔招降书，利用李秀成与投降对象之间的父子、兄弟和部属等关系，依次进行誘降。

第四，宣布“恩赦两广之人勿杀”发给免死凭证，回乡当顺民。

第五，要求南京城内“停刀勿杀”。不论职位、籍贯，一律赦其死罪。并发给凭证和川资，遣散回乡，好使他们宣传曾国藩弟

兄的“寬恩”。

第六，在“各省远近州县乡村”，張貼告示，宣布依照南京前例，不论何人，一律赦免死罪，当大清顺民。

李秀成估计：如果曾国藩采用了这个计划，很快就可以瓦解、消灭太平军和捻军的革命力量。“天下聞知，无有不服”。不仅“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复(服)，就连“稳(稔)匪作乱”，也不难“举手而平”。

但是，李秀成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历史的年輪，並沒有依照叛徒的意愿前进。一方面，革命人民决不是李秀成所想象的“具(俱)是怕死之人”，可以“寄话而从”，“举手而平”。事实上，清政府鎮压革命人民不是早已采用了勸撫兼施的两手嗎？可是，延续不熄的人民革命的火焰，终归把清王朝埋葬了。另一方面，老奸巨猾的曾国藩虽然对李秀成的“用仁爱为刀而平天下”的献策，认为“其言頗有可采”；但却不相信太平军余部可以“凭该逆(指李秀成)尺书全数就擒”。①何况，杀人如麻的曾剃头也决不会因为李秀成的“献諛乞怜”②而轻易放过他的。

其实，曾国藩到达南京的第二天，就已决定要杀掉李秀成，只因要从这个叛徒的嘴里獲得太平军的情报，要“取伪忠王详供”，③才耍了一个花招，假意表示惋惜，④许以“迟究”，“听旨”⑤。正在追悔“一身(生)屈错，未逢明主”的李秀成，击中了心坎隱痛，立刻倒向了新主子的怀抱，发誓“要先行靖一方，酌报昨夜深惠厚情”，縱使肝脑塗地，也“死而足愿，欢乐归阴”了。但是，当“自愿将国中一切供呈”写完以后，准备当“大清民根”，效劳报恩时，劊子手曾国藩取得了这份“详供”，立即派人告诉他：“国法难违，不能开脱”。李秀成活命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但他还至死不渝地感激这位老中堂的“厚德”，发出了“今

世已誤，来生愿图报”⑥的哀鳴！

叛徒李秀成的可耻下场，给一切革命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任何风险情况下，必须坚持革命斗争，在任何面貌的敌人面前，决不能示弱。“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活”。抱着“保全脑袋主义”的“活命哲学”是必然要走到叛徒的可耻的下场的。

李秀成认贼作父，挖空心思替曾国藩想出了一整套太平军投降，当大清顺民的所谓“收齐章程”。这是李秀成自己提供出来的叛变投敌的确凿罪证，不可能还有任何其他解释。但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二十多年的罗尔纲同志却硬说“‘招(收)齐章程’不会导致瓦解太平军，却可以使敌人暂时停止攻击，而乘机谋取长江南北大军会师任务的完成”；“李秀成这一条计策叫做苦肉缓兵计”。说也奇怪，为什么同样一篇《李秀成自述》，却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呢？难道罗尔纲同志真有什么别人没看到的珍藏秘笈嗎？不，问题不在于引证史料的多少，而在于支配、运用史料的观点和方法的分歧，两种世界观的分歧。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25，《贼情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②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26，《欽奉諭旨分条复陈折》。

③ 《曾国藩手書日記》，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附記。

④ 据李国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辞并跋》轉述他父亲的話說：“忠王被擒，置囚籠中……文正(曾国藩)熟視之：汝即李秀成耶！汝亦好汉。可惜！可惜！长叹不再語。李大哭，即請紙自供，并乞赦，当招余党”(見《学风》第七卷第五期)。

⑤ 赵烈文：《能靜居士日記》，見《太平天国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381頁。

⑥ 赵烈文：《能靜居士日記》，見《太平天国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381頁。

五、两种世界观，两种结论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

“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①。

又说：“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②“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③。

毛主席所指示的这一基本原则，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南，关于李秀成问题的研究，当然也决不会例外。但是，罗尔纲同志却把它丢在脑后了。他的这篇长达七万多字的“苦肉缓兵计”，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李秀成自述》和有关史料出发，而是援引章学诚的“论古必恕”的“理论”作为其指导思想，从虚构的两个“假设”出发。

他在正文开端处引证章学诚《文德》里的一段话：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谓，况生千古以后乎！”^④

他认为这一段话是章学诚提出的“理解古人文辞必须掌握的原则”，是“一条教人理解历史人物有所而言的启示”。其实，这是一种从陈腐的封建教条为出发点的、主观唯

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毫无共同之点。罗尔纲同志把章学诚的文章斩头截尾地摘取中间一段。原来，这是章学诚“论古必恕”的理论。在这段引文的上文，章学诚这样写道：“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将置君父于何地？”是为陈寿和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作辩护的。在这段引文的下面，紧接着说：“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道大矣！”看来，罗尔纲同志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还没有完全摆脱陈腐的封建教条，要用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来为投降了敌人的变节分子辩护，从而不自觉地站到了反动的立场上去了。

罗尔纲同志从章学诚那里借来了一句“至理名言”：“有所为而言”，把它当作“启示”人们理解历史人物的“原则”。实际上，这是一种“超阶级”的唯心论。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早就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⑤“言为心声”，人们说话，就是表达他的思想。除了白痴或疯子而外，难道还有什么“无所为而言”的说话吗？

罗尔纲同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33—11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1—822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82页。

指导自己进行研究工作，而是举着章学诚“启示”的“原则”：“有所为而言”，作为引路幡，进行他的“探微索隐，幽发潜”的历史考据。他虽然也提到“要理解李秀成这一问题，必须先要知道他的时代和他的当时个人的遭遇”。但实际只是“论古必恕”的另一种表述。他并没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李秀成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联系阶级斗争的形势来考察，而是从自己对《李秀成自述》的主观想象出发，凭空假设李秀成自己再三声明的“并未瞒隐半分”，“明白写呈”的供辞，是因为害怕敌人看穿了他的伪降鬼计，从而写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在这种主观想象的前提下，罗尔纲同志把李秀成在《自述》里招供的一切诬蔑革命和革命人民、恭维敌人的话，都说成是为了“哄骗曾国藩”的“自污”、“自辱”的假话。例如，在《自述》里李秀成再三叙述了他“不欲扫北”，“逆主之命”的大量事实。罗尔纲同志却一概当作假话，单举李秀成的进军上海徽文里的官样文章，证明是“假造与天王不和的事实”。又如进兵上游，合取湖北的战略计划，《洪仁玕自述》明说是洪仁玕建议的，他却根据曾国藩的奏折，说是“李秀成制定的”等等。

这样，李秀成招供的“真实言也”，经过罗尔纲同志的“考证”，全都变成了自污的“假话”了。接着，他又“根据上面考出的事实”，得出“李秀成自传那些自污的话是‘有所为而言的’”的结论。接着又自问自答地写道：“李秀成有所为而言的目的何在呢？其目的不外两端”。哪两端呢？他又凭空提出了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

“李秀成自传那些自污的话是为着要投降怕敌人不肯相信而说的吗？”第二个假设是：

“李秀成是不是别有意图呢？他向曾国藩提出‘招（收）齐章程’是不是假的呢？”

罗尔纲同志用“系铃解铃”的手法，列举

了七项理由^①推翻了自己提出的第一个假设，从而肯定了第二个假设。那就是“李秀成确是别有意图，他向曾国藩提出‘招（收）齐章程’是假的，他用的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罗尔纲同志这样从一个假设到一个假设，推衍下去，“自己造庙，自己拆”。单凭主观想象，不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这种研究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背道而驰的。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所采用的先验主义方法时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②。毛主席教导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③。罗尔纲同志的研究方法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相对立的先验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

我们分析罗尔纲同志这种先立假设，后找史料来推翻或肯定的研究方法，很容易联想到买办学者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虽然这个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早已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了；但是，他所播散的“实验主义”，阴魂未散，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现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象灯塔一样照耀着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向。作为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战士的历史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要把毛主席著作棄置一边，把无产阶级世

① 李秀成对革命有坚定的信仰、不貪財腐化，經得起考驗，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者，不貪生怕死、不怕酷刑，未受曾国藩的欺騙等等，大都针对戚本禹同志第一篇文章而言，戚同志在第二篇文章里已加駁論，这里不必贅述了。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75頁。

界观、方法论丢在脑后，反而援引封建时代史学家的陈腐教条作为研究历史的“启示原则”。试问：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究竟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应该指出：“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①。我们研究李秀成的目的，是为了揭露这个叛徒的丑恶行为和他的可耻的下场，从而教育人们：在任何时刻，必须站稳立场，坚持对敌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为了替叛徒涂脂抹粉，把他打扮成为革命英雄，引导人们混淆是非，模糊敌我界限，从而在革命风浪里迷失方向。

在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大肆宣扬什么“活着就是一切”，“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②等等的“活命哲学”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家竟然想方设法给李秀成的怕死乞降，出卖战友的叛徒行为打掩

护，这不正是替现代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帮腔吗？不是为敌人的猖狂进攻作内应么？

罗尔纲同志的“李秀成伪降说”已经通过《笺证》播散了广泛的不良影响了，直到现在还要用类似“曲线救国论”的“苦肉缓兵计”，把一个农民革命的叛徒打扮成为智取敌人的革命英雄。这样的历史研究工作，究竟能为什么阶级服务呢？对谁有利呢？我们诚恳地希望罗尔纲同志正视这个问题，仔细地思考一下，回过头来，履行十四年前您自己所表白的诺言：“不掩饰自己的错误，每遇有新史料或正确的新观点纠正我的错误时，就立刻自动的推翻前说，改从新说”^③吧！

① 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第51页。

②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③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0年序文。